

关山远

1949年3月23日，一支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行进在华北大地上，山道弯曲，尘土飞扬。

开道车是一辆小吉普，扬起的尘土全落在第二辆中吉普上面，毛泽东就坐在这辆中吉普上，戴着风镜与口罩来抵挡灰尘。他的心情大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因为，他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车队的行进路线是：西柏坡、灵寿、正定、曲阳、行唐、唐县、保定、徐水、定兴、新城、涿县，再换乘火车，目的地——北平。

北平！北平！毛泽东怎不思绪纷飞！距离他上一次来这座著名的城市，已经整整30年了。

那时，他还是一个“北漂”，穷困，然而，并不潦倒。

—

1919年的年初与年末，26岁的毛泽东都是在北平度过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官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不无穷的欣赏……”这是出版于1937年7月的《毛泽东自传》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自传》，由毛泽东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而成，被誉为“中国第一自传”，是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斯诺彻夜长谈，回忆往事。在斯诺的记载中，“北平”与“北京”交替出现，不是传主口误，也不是译文错误。

北京，这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北平”之名，要远早于“北京”。“北平”一词，最早源于战国时燕国置右北平郡。西晋时，右北平郡改称北平郡，北平作为一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行政区划中。1368年（明洪武元年）9月12日，大都易名为北平府，取“北方和平”之意，后于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改名为北京，与南京对应。

从1912年3月到1928年6月，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伐战争后，首都迁至南京，北京改为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将北平又改为北京，但并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沿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恢复原名北平，再一次改为北平时，要等到1949年9月27日，当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9月3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翌日，就是开国大典。

一个30年前的“北漂”，主导了北平这座古城的改名与新生，一个何等励志的故事！

此前，毛泽东两次到过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一直待到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率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张”即为祸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毛泽东这次在北京待到1920年4月，离京赴上海继续驱张活动，当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7月，毛泽东从沪返湘。

这两次来京，“北漂”毛泽东在北京城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怎一个“苦”字了得！他青年时代的好友罗章龙后来回忆说：

“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充分劳逸，体弱及事得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煮，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

韩浩月

在朋友圈看到老家下雪了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北京三里屯等待叫的出租车。已经是夜晚了，路上堵车车堵得厉害，霓虹闪烁，寒风凛冽，耳边偶尔传来几声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然而在我看到老家下雪了这几个字的时候，时间好像忽然慢了下来，空间也似乎突然静了下来，脑海里浮现出一片老家下雪的场景。

老家下的雪，是真的雪。不是说北京的雪就不是雪了。北京的雪总是有点矜持，千呼万唤之下，方缓缓从空中降落，稍有点鹅毛大雪的意思，风一吹便散了，薄薄一层的雪落在交通繁忙的大街上，被车轮一碾就化成了水。这两年，周边的城市总是偷偷地背着北京下雪，北京干脆成了一个没雪的城市。

老家处在北方与南方的交界处，但整体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小城，每年的冬天，都会至少有一场像样的大雪。说老家的雪大，也是相对而言的，真正的大雪，要追溯到30年前——不把门堵上一小半，早晨推门推不动的雪还叫大雪吗，不让草垛胖上一大圈全变成超大号“馒头”的雪还叫大雪吗，不让家犬急匆匆跳出门外双腿陷入雪地走不动步等待主人救援的雪还叫大雪吗……

以前老家的冬天是难熬的，身上穿的不暖，寒冷无处躲藏，但偏偏下雪的那几天，孩子们都变得不怕冷了，打雪仗，吃冰凌，回到家鞋窝里都是化了的雪水，拿炉子边一烤冒出热腾腾的蒸汽，吃点东西还没等鞋

不动声色

100年前，一个“北漂”青年的励志故事

“

在北京的严寒里，青年毛泽东穿着与同乡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驻足于冰雪之间，在一片银装素裹中，凝视若火焰般绽放的红梅，满心欣赏，热血沸腾。他乐观，不焦虑；他不抱怨，努力寻找问题症结与解决之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强健，还有信仰的力量

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作为韶山一个农民儿子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农村，来到大城市，是在1911年，他步行120里路，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他跟斯诺描述过当时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我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时我想到那里去……我步行到长沙，心中极端地兴奋，一半生怕被拒绝，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毛泽东自传》）这一年，毛泽东18岁。

第一次到北京，也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的远行，但跟当年初到长沙相比，兴奋仍在，却远远少了那份紧张，他已经相当自信了。

自信，是毛泽东的重要性格特征。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豪迈自信，透纸而出。《毛泽东家书》中收录过他的一封信，上面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加“猴气”，能够很好解读毛泽东的性格特征：“虎气”是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猴气”是灵活机智，敢于反抗——毛泽东的猴，是他特别欣赏的孙悟空。学者刘峰在《领导哲学》一书中分析说：

毛泽东所说的虎气，主要指领导者的勇气和担当，所说的猴气，主要是指领导者的智商和情商。“概言之，毛泽东的特质是大智大勇高情商。”

自信心的养成，离不开一个人的学习和见识。在长沙就读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而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善于思考，勤于调研。他对中国社会的真正了解，他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远远超过了留学归来的洋博士们。

毛泽东出身农家，貌似输在起跑线上，事实上，他一直被轻视。在湘乡读高等小学，“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在北京，被欧美博士轻视；在中央苏区，被苏联留学归来的“二十八个布布尔什维克”轻视……但轻视，能击败毛泽东吗？

三

并不是所有人都轻视“北漂”毛泽东。一个是对他影响极大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一生以“欲栽大木柱长天”诗句明志，堪称毛泽东的启蒙先师。他在长沙时就对毛泽东另眼相看，其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成为“异才”。

他从湖南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促成了毛泽东等人的首次北京之行，为一众老家来的北漂青年东奔西走、倾囊相助，他更成为毛泽东在北京的引路人，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也是在北京时期，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产生了炽烈的爱情。

老家下雪了

过村庄里那么大的雪了。雪不喜欢人聚集的地方，人口密度越高，雪就越稀薄。不是雪害羞，是雪有点恶作剧心理，你越盼着它下得大一点，它越不给你面子，而在村庄，人们看一眼天际线，呼吸一下空气，品尝一下嘴里的味道，说一句今晚可能要下雪，便不再多言了，第二天早上，准给你一场意料之外的大雪。

五六年前我回县城过年的时候，和朋友在街边的饭馆喝酒，那晚的雪下得很大。喝完酒出门接近半夜了，雪把楼房、街道、学校什么的都覆盖了，雪把县城变成了村庄……我们开心地，趁着大街上一辆汽车也没有，把街道当成了滑雪场，开始的时候还是用脚打滑，后来干脆猛跑几步然后把整个人摔出去，一下子摔出好远，几个接近40岁的男人，变成了男孩。我们还去了老同学的家门外，捏了雪团砸他家的窗户，把他从暖被窝里拉了出来，和我们一起滑雪。

等我叫的出租车到了，离开三里屯的时候，关于老家下雪了的消息，在朋友圈变得更多了，有人开始不断地发小视频刷屏。我在老家的朋友群里问了句，“听说老家下雪了？”瞬间的工夫，好几个朋友都开始回应，看来，大家对下雪这件事都觉得很兴奋。出租车里的暖气开得很暖，刷了一会手机闭上眼睛假寐，脑海里在想，“老家”，“下雪”，这只是两个简单的词汇，为何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带来如此大的信息量，造就如此庞大的意境？莫非不是，下雪这件事很平常，而我开始想家了吧。

转眼进入冬季，忽而想到大冷天了，要看看那些小

路人，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也是在北京时期，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产生了炽烈的爱情。

一个是亦师亦友的黎锦熙，他比毛泽东只大4岁，湘潭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历史教员时，认识了毛泽东，认为他“大有见地，非庸碌者”。1915年，黎锦熙离湘到京任职，毛泽东给他写过6封书信，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无话不谈。毛泽东到北京后，黎锦熙很高兴，两人有空就在一起交流，得知毛泽东生活清苦，黎锦熙常请毛泽东打打“牙祭”。两人此后失去了联系，黎锦熙冒着危险，一直保留着毛泽东的6封信。漫长的30年过去了，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北京时，已经是即将夺得全国胜利的中共领导人，他上门拜访黎锦熙，开口就叫“黎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前夕，黎锦熙痛感台湾沦落日寇之手半个世纪，以日语为官方语言，遂倡议和推动大后方多所学校创办国语专修科，为在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学者达100多人，台湾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对于推进台湾与大陆“书同文、语同音”，起了巨大作用。

还有一个是邵飘萍，上世纪2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记者，毛泽东首次到北京时，邵飘萍任《京报》社长。《毛泽东年谱》载：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听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邵在经济上的接济。”

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声名鹊起。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在江西瑞金诞生后，毛泽东就不断写稿，1947年解放军撤离延安、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以后，新华社集报纸、电台、通讯社于一身，毛泽东撰写的稿件全部由新华社播发。他爱用新华社记者名义写评论，尖锐犀利，气势磅礴，引导舆论，震慑敌人，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可见，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毛泽东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一直感激邵飘萍，他跟斯诺谈话时，评价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1919年的北京，毛泽东像寻常青年一样，精力旺盛，兴趣高昂，学习、恋爱、打工、交友、写作、游览、参加社团……跟寻常青年不一样的，他广泛地结识各路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在北京，他认识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梁漱溟、蔡元培、傅斯年、陈公博、周作人……这些人，都在日后的岁月中，跟他有过交集，命运的不同走向，更让人感怀那个年代的风云际会。

当然，北漂期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

四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不仅当过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毛泽东如何看待李大钊？在李银桥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1949年3月“进京赶考”的路上，离北平越来越近时，毛泽东感叹道：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

宋庆法

办公室南窗不远处有一蓄水池塘，水深大概四五米，没有水生植物点缀，偶见鸟儿飞掠点水才打破平静。风和日丽时，看上去就是一面长方形镜子，日月星辰，白云黑云，收纳空中百态；阳光射下来，波光粼粼，映出道刺眼金光；天气骤变时，遇到风来，吹起水纹一池。

就是这半亩方塘，吸引了不少小野鸭，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也不知什么时候飞去，它们又最惧怕人，不允許到跟前围观，隔着老远看，黑不溜秋一小不点，比刚孵化出的小鸭大不了多少，在水面游动的姿势，脖颈一伸一伸，滑稽可爱。此时，方能悟出冯延巳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接红杏蕊。小鸭闹水独游，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在，举头闻鹊喜”。

闲下来时，免不了起身对窗望出去，偶尔能看到几只小野鸭浮游，身后拖着长长八字形水纹，活像是尾巴后面的两条长辫子，间或一头扎进水中，从何处窜出来，是个未知数。曾扳起指头读秒，看它能在水下待多长时间，不超过20秒，它们准会浮上水面来换气。如此反复，不是在练习潜水能力，是在水下寻觅果腹之物。又想，本来清清一塘水，也没放养鱼虾之类，它们能寻觅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既然常住这里，必定有其一定道理，大概是自然野生了些小鱼小虾，不是的话，它们不应该如此流连忘返。

时间长了，幻想出这样一个画面：野鸭们以为为家，久而久之，必定会繁衍出许许多多子孙来，倘再放进一具经典吹气橡皮黄鸭仔造型，空中蓝天白云悠悠，野鸭们老老少少大家庭一塘，晨凫日至，候鸟衔芦，该是非常令人欣愉的童年场景。

转眼进入冬季，忽而想到大冷天了，要看看那些小

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也很动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在1918年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在1919年《新青年》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在此前后，李大钊不仅亲自撰文，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1920年，李大钊除继续撰写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毛泽东少年时代，曾经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一度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他坦承自己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时，思想一度比较混乱，“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倾心研究和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了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传》中这么写道：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当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主义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仔细认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 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就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伟大的转变已经发生，一个开天辟地的时刻即将到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五

今年是2019年，距离毛泽东“进京赶考”，已有70年漫长的岁月；他离乡“北漂”，更是足足100年前的事了。

但有一个镜头是永恒的：在北京的严寒里，青年毛泽东穿着与同乡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驻足于冰雪之间，在一片银装素裹中，凝视若火焰般绽放的红梅，满心欣赏，热血沸腾。他乐观，不焦虑；他不抱怨，努力寻找问题症结与解决之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强健，还有信仰的力量。

这个镜头，最好的配乐，是1919年的流行曲《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1]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管理15种报纸，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月薪8块大洋，非常低的工资了——当时同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一个月能拿420块大洋。